

我国古代早期文献中有关人群 体质形态特征的描述

汪子春

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是在近一、二百年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有关人类学知识的发源，无论是在西方或是东方，都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年代。

著名的古代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77年）在他有关著作中，早就阐述了气候以及其它自然条件对人类疾病和体质特征的影响。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曾将人体和猿猴等动物体的形态构造进行了比较，注意到了人类自然的和社会的属性，认为人是“社会”动物。

我国古代哲学家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也注意到人与猿在体质形态上的相似性，以及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别。他说：“今夫狌狌形笑（疑为“状”）亦二足而无毛”。又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辩也。”（《荀子·非相篇》）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要特别谈到的是，我国古代早期文献中，关于我国古代居民体质形态上正常差异的描述。

《周礼》一书，据夏纬瑛先生近年的研究，认为是战国年间齐国学者所著，它是一部讲建立国家后，应怎样设官分职的书。^①

《周礼·地官·司徒》指出，大司徒之职是，掌理天下土地舆图和记载人民的户籍，辅佐王者安定天下。“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

毓草木，以任土事”。由此可见，根据生物与地理环境的相适应关系，调查辨别各地区所出产的动植物，考察人类的居住环境，从而知道应该怎样扬长避害，使人民健康兴盛，鸟兽繁殖，草木繁茂，发展生产，这乃是当时地官大司徒这种官员的重要职责。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把考察人群居住环境问题，也列入了当时的政府工作范围。他们实际上考察了各地人群体质形态特征。

《周礼·地官·司徒》对居住在五种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群的体质在形态上的差异作了具体描述：“一曰山林……其民毛而方”。“方”，大也，正也。这是说，住在山林地域的人民，身体壮大端正而多毛。“二曰川泽……其民黑而津”。郑玄《注》云，“津，润也”。这是说住在川泽地域的人民，体黑而润泽。“三曰丘陵……其民专而长”。“专”是“团”的省文，《说文》：“团，圜也”。这是说，住在丘陵地区的人民，身体圆而长高；“四曰坟衍……其民皙而瘠”。郑玄《注》云：“水崖曰坟，下平曰衍”。又“皙，白也，瘠，瘦也”。这就是说，住在坟衍地域的人民，体白而瘦；“五曰原湿……其民丰肉而庳”。郑玄《注》云：“丰，犹厚也。庳，短也。”这是说，住在原湿地域的人民，肌肉丰厚，身体矮小。

夏纬瑛先生在谈到《周礼》这段有关居民体态记述时指出，各地方人民的体态不同，并不全是地理环境的关系，主要是，由于地理上的隔绝，各地方人民的往来较少，婚姻的范围有所限制，遂于人民的体态上形成其地方性的特点^②。我们认为夏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二千多年前，由于地理上的隔绝，各地区人群在体质方面，出现象《周礼》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形态差异，是完全可能的。

《黄帝内经》(公元前722—前221?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理论著作，它包括《黄帝内经素问》和《灵枢经》两书。《灵枢经·阴阳篇》详细而具体地描述了古代居住于我国各地人群的体质形态特征。《灵枢经》把人类体质形态分为木、火、水、金、土五种类型。一为“木形之人”，“其为人苍色，小头，长面、大肩

(两肩宽阔)、背直、身小、手足好(手足灵活)”，二为“火形之人”，“其为人，赤色，广胸(背脊肌肉宽广)，脱面(面瘦)、小头、好肩背、髀腹(肩背髀腹各部发育都均匀)，小手足，行安地(步履稳重)；三为“土形之人”，“其为人，黄色，圆面，大头，美肩背(肩背发育健壮)，大腹，美股胫(下肢强壮结实)，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称(全身上下均称)，行安地(步履稳健)”；四为“金形之人”，“其为人，方面，白色，小头，小肩背，小腹，小手足”；五为“水形之人”，“其为人，黑色，面不平，大头，廉颐(颐部呈棱形)，小肩，大腹，动手足(手足好动)，发行摇身(行路时摇摆身体)，下尻长(自腰至尻距离较长)，背延延然(背部长度也超过一般的人)”。

《灵枢经》将人群体质从形态上分为五种类型，这显然是受了阴阳五行的影响。看来这五种类型的人代表着五方人的形态特征。《灵枢经》指出：木形之人，似于苍帝；火形之人，似于赤帝；土形之人，似于上古黄帝；金形之人，似于白帝；水形之人，似于黑帝。中国古代根据五方分配五色，苍色属木，位于东方，所以把东方称为苍帝所居。“似于苍帝”，就是说，木形人的形态就象东方人一样。根据同样道理，火形人的形态，就象南方人；土形人的形态，就象中央地区人；金形人的形态，就象西方人；水形人的形态，就象北方人。《灵枢经》所描述五种类型人，具体究竟包括哪些地区、哪些民族，这是有待人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大家知道，从西周到战国，中国的疆域，在不断地扩大。因此也不断地拓扩了人们的视野，积累起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由于经济、文化的交往和接触，必然也大大增进了人们对各地区和各族人民体质状态的了解。《灵枢经》的详细描述，使我们相信，我国古代学者，可能曾经对居住在祖国大地上的人群，进行过某种调查研究。有些描述，如：“小头”、“长面”、“广胸”、“小肩背”、“下尻长”等等，使人感到它只有在对人群进行人体测量的基础上，才能作这些描述。人体测量，是近代人类学研究

的重要手段。而它在我国同样已经有悠久的历史。《灵枢经》中有《骨度》篇，就是专门记述人体测量的。《骨度》篇说：“先度其骨节之大小、广狭、长短，而脉度定也”。可见古人进行人体测量与医学实践是有密切联系的。《骨度》篇中所记录的人体测量项目，从“人长”、“头之大骨围”、“胸围”、“腰围”、“两颧间相去”、“足宽”、“足长”等等有三十七个项目之多。其中许多测量项目，如身长、胸围、腰围、足长、足宽等等不仅为当今人类学家所沿用，而且有的项目连名称也一直保留到现在。

《周礼》和《灵枢经》关于人群体质形态特征的描述，主要是根据人体肤色和头、面、肩、背、腹、足等各部位的形状、大小。这些也都是现代人类学家用来描述人类体质形态的重要根据。无论是在中国古代或是西方古代，象《周礼》、《灵枢经》这样，对人群体质形态特征作如此详细的描述，实在不多见。这些描述和记载，不仅为科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也为今天我们今天的人类学者、民族学工作者，了解古代人的体质特征留下了可贵的资料。

我国古代学者不仅研究了我国古代居民人体形态的正常差异，而且也对人类与水土，季节气候等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人类学的研究。《灵枢经》不仅描述了我国古代各方人群的体型特征，而且还指出了各类型人对季节气候反应的差异。如《灵枢经》指出，木形人（东方地区）和火型人（南方地区）大都能耐于春夏时令，而不能耐于秋冬时令。相反，土形人（中央地区）、金形人（西方地区）和水形人（北方地区）大都能耐于秋冬时令，而却不能耐于春夏时令。

《黄帝内经》还记述了我国古代学者，关于不同地方的人群对疾病有不同反应的认识。《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篇》指出，东方是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所以那里的人“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西方“多风”，“水土刚强”。其民“陵居”，“华食而脂肥”，所以“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

内”；北方“地高”“风寒冰冽”，其民“陵居”，“乐野处而乳食”，所以那里的人，多患“满病”；南方“其地下，水土弱”，多“雾露”。那里的人“嗜酸而食附”，所以“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痺”；中央地方“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

人类疾病，是多种多样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我国古代学者，从人类生态学角度，考察、分析人类居住环境条件、生活习惯、人群的体质状况同疾病发生的联系，这种思想无疑是先进的。

《管子》一书，多次谈到水土条件对生物和人类的影响。它指出，水地是“万物之本原”，并称水为“水神”。

我国古代学者，早就在探索不同水土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吕氏春秋·月令》记述了生活在五种不同水土上的人群与疾病的关系。一是“轻水所多秃与瘦人”（高诱《注》云：秃无发，瘦，咽疾）；二是“重水所多蹇与躄人”（注云：肿足曰蹇。躄，不能行也）；三是“甘水所多好与美人”；四是“辛水所多疽与痤人”（注云：疽、痤，皆恶疮也）；五是“苦水所多伛与伛人”（注云：伛，突胸仰向疾也。伛，伛脊疾也）。这里所提到五种水所，究竟指哪些地区，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但是，众所周知，各地方的水质好坏，与当地居民的健康的确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有许多疾病，就直接与饮水有关。据说，远古时候生活在雁北地区的“许家窑”人就患有氟齿病。而这与现在当地人所患的病，竟是一样的。据调查，原因就是因为当地浅层地下水含氟量过高。它对人体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牙齿上，而且也表现在骨骼上。在河北省阳原县东井村以南，成年人当中，有的腰背弯曲，有的脚上生长骨刺，严重地影响了人体的健康。现在政府已拨款在那里打深井，以解决当地人的饮水问题。

《管子·水地篇》还具体谈到古代齐、楚、越、秦、晋、燕和宋等地区的水质对当地人健康的影响。例如说：“越之水濁重

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姤”。这意思是说，越地，即古代越族的居住地江南地区，由于水质混浊，并且向外浸润，所以当地人较肮脏，并多患恶疾。《史记·货殖列传》也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司马迁单单提到江南卑湿，男人短寿、早夭，该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反映。当然，造成男人的早夭，不会是仅仅是自然的原因，而一定还有别的社会的原因。

近来，有的生物学家已经指出，对还“处于十分艰难环境下的少数残留的原始人的隔离群体进行结构与功能对气候条件产生适应的人类学研究”，“是更为有益和迫切的”。因为人们知道，“由于地理上障碍的破坏，人类的日益杂交和文化的漫延，这种隔离状态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因此生物学家们呼吁人们“在机会还未失去的时候，有必要对他们的体型、肤色、头发、血型、细胞遗传学、对冷热的生理反应、对疾病的感受性以及其它特征作一系列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③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长久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早就彼此密切往来，并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学和文化，从而大大丰富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提高了人民的体质健康水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二千多年前的社会发展水平，是无法与今天相比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水平是不会相同的。在古代社会中，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一定会比现在保留着更多的地理上的隔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古代早期文献中，有关我国古代各地区人群体质特征以及他们对疾病的感受性等等记述，对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它对于历史地理学和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来说，无疑可作为一种很好的历史资料而加以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介绍的文献中，除《黄帝内经》是属于医学著作外，其它如《吕氏春秋》、《管子》和《周礼》等，都是属于社会政治思想方面著作。这说明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不仅医学家重视，而且社会政治家也非常注意人群的体质特征和他们

对疾病的感受性。在古代，这种知识，可能不仅来源于医学实践，而且也来源于社会调查。

注释：

- ① 夏纬瑛：《〈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农业出版社，1979年，第3页。
- ② 同①，第98页。
- ③ （美）P.辛德莱主编：《生物学与人类的未来》，科学出版社，1977年，第186页。